



年份原浆®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有奖征文

马耳坡上望祖国

(安庆)李晓

马耳坡是我故土的一个山梁,它在中国地图上没有标识,这个丘陵地带的山包只有70多亩面积。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国土面积上,马耳坡只是雄鸡版图上的一个小小的蛋。

1946年,我爷爷从长江边的一个村子,拖家带口搬到马耳坡。随后,马耳坡上用山草搭建起的茅草房,在风中如一个披头散发的人。一个家就在这里,在马耳坡上,长成一棵树,开枝散叶。

1949年,新中国迎来黎明的那一年,我爷爷38岁,他在马耳坡的月光下,开垦出10多亩荒地,种上自家粮食。我父亲12岁,在王先生那里上私塾,读《三字经》《百家姓》那类古书。

1958年,马耳坡的风中,吹拂着一个兴奋的消息。我21岁的父亲,考入县城一所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就读,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爷爷赤脚跑回长江边的村子,在祖宗坟前焚香磕头,尔后又一口气跑到公社办公室表达感谢。

1969年8月的一个黄昏,我在马耳坡上的草房中出生。

1977年12月,来马耳坡上山下乡参加劳动锻炼的县城知识青年小薛,回城参加了当年全国有570万人报名的高考,他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

1978年12月的马耳坡上空,响起一个国家命运新航程的春雷声。我父亲从县城机关回家,肩负一个新任务,与公社干部一起向乡民们传达那一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一个在马耳坡上沉睡已久的村庄,也开始翻动疲惫的身子。

1981年初,马耳坡上的这个村庄,开始实行农村土地包产到户。那一年的秋收,我们家的水稻田,亩产达到了760斤。秋天的马耳坡上,我爷爷种的红高粱,如红彤彤的晚霞落地燃烧。我家谷粮满仓,公社和大队干部进屋,伸出手指头一敲,装满稻子的大柜子发出沉沉声音。难怪那一年春天的蛙鸣叫得特别欢,我爷爷背着手在入秋后的稻田里庄严巡视,时不时伸出手去沉甸甸的稻子上摘下一颗谷穗放进嘴里,他卷动舌头,咀嚼新米的味道,风吹稻浪,我看见爷爷额头的皱纹也欢快地漾开。

1988年,19岁的我离开马耳坡,进入一个乡里当了干部,按照马耳坡上的乡人说法,我是吃上了“皇粮”。

2000年3月,马耳坡上空腾起阵阵烟雾,马耳坡的起伏丘陵在轰隆隆的爆破声中消失了,从此这块小小的故土成为我永久的怀念。毗邻马耳坡的地方,要修建一个山顶上的机场,那一年三峡游正热遍这个国家,机场建设是为这个腾飞的城市插上翅膀。

2003年5月,通航后的第一架飞机从成为巨大坝子的马耳坡上空飞过,我堂伯抬头眯眼一望感叹说,飞机就像是在屋顶上飞。

2005年9月,69岁的堂伯和我婶娘从故乡机场乘飞机去北京旅游。在北京,堂伯去了天安门看清晨的升旗仪式,这个一辈子匍匐在泥土里的庄稼人缓缓抬起右手,向喷薄日出中迎风招展的国旗致敬。

而今,马耳坡上的机场,已经开通了到上海、西安、广州、昆明、厦门等20多个城市的航班。去年,机场扩建成为国际机场,已开通到泰国清莱的航线。

马耳坡的编年史,让我看到,这片弹丸之地,一直在与这个伟大国家铿锵前行的步履如影相随,与中国波澜壮阔的命运,唇齿相依。

烫发

(山东) 马海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姐和同学结伴去城里理发店烫头,临烫时别人都退缩了,就姐一个人烫了头。天擦黑才裹着头巾溜回家。没成想还是被我爸发现,满屋找剪刀要给姐剪成秃子。吓得姐跑到奶奶屋里,用热水洗,用刮虱子的篦子梳,还是卷如故。

第二天一早,姐将满头卷儿编成麻花辫,刘海用小卡子卡住。奶奶替她在我爸耳边说了半天好话,大意是,她知道错了,昨晚忙活了一宿,卷儿都梳直了。这才安抚下我爸那把带怒气的剪刀。

那个年代,女孩烫发和男孩穿喇叭裤花衬衣都属于“不学好”,一旦发现,烫发和喇叭裤都逃不过父亲那把剪刀。

我六岁那年,姑姑用筷子置于炉火上烧热,再将头发扯起一缕缠绕在烧热的筷子上,停留几秒钟,抽掉筷子,直发便烫卷了。我小时候是短发,姑姑用筷子卷头发也费了半日功夫。烫完后,姑姑看了又看,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

晚上回家时,我有些害怕了,害怕父亲的剪刀。姑姑说,莫怕,这个是一次性的,第二天起来就全伸直了。

我一路忐忑走回家,父亲瞥见我顶着满头卷,黑脸问母亲:“咱家的剪刀呢?”我吓得“哇”一声便哭了。打那以后,姑姑再也没有给我烫过头,她怕挨父亲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上小学。那时叔叔已是村办企业的厂长,他走南闯北,是村里最有见识的人。那年暑假,叔叔刚从上海出差回来,要带着我和表姐去烫头。父亲当然不同意,但叔叔是家族里混得最出息的人物,父亲也得给他三分面子。叔叔告诉父亲,烫头钱他出,暑假烫了头,等到开学时

再去理发店弄直了。父亲听叔叔这样说,心里纵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憋着。

叔叔用自行车载着我和表姐去了城里的理发店,到了店里问,哪种烫发适合小孩子。理发师说,哪种烫发也不适合小孩子,如果非要烫的话,就冷烫吧。

没想到,理发店那天停电。叔叔比我们还懊恼,回到村里逢人便说:“想给两个孩子烫头,却因停电没烫成。”虽然头没烫成,但烫头之事却很快传遍了全村。说来奇怪,后来,村里再有女孩烫头,再没听说过被剪成秃子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女孩结婚,提前一月烫头,结婚前三天再去理发店定型,是我们那里必然的流程。记得姐结婚前,正值秋收,姐忙着干农活,耽误了烫头。我爸竟黑下脸骂:“啥时候了,也不烫头,临上轿现扎耳朵眼吗?”

渐渐的,烫头也不是啥新奇的事了,连老太过年时也要烫头时髦一把。烫头也不再局限于越卷越好,而更注重造型。

姐最近几年,忙儿忙女,都顾不上捋犄角了。那日回娘家,我爸忍不住劝她:“去烫个头,染个色,打扮一下,别整天灰头土脸的让人瞧不起。”

姐回:“不是您当年要剪我头发那会儿了?”

我爸说:“我那是做做样子,不吓唬一下你,让街坊四邻笑话我没规矩。”

嘿,看来叔叔当年就是摸准了我爸这类人的脉,才故意挑个城里停电的日子带我和表姐去烫头,做给村里人看的。叔叔在烫头这事上,功劳不小呀。

叔叔说,错。是社会发展流行趋势,谁也阻挡不了。

我有一江水

(安庆) 海豚

最初的印象里,长江就是我们家门前的一个大河。晨光初起,父亲担着水桶出门,从江里挑来水,晃悠悠地往家走,水在桶里晃荡,阳光在水里晃荡,水连同阳光晃出了桶,溅到地上,留下一道道新鲜的印迹。

江边最热闹的时节是夏天。吃过晚饭,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邻居们成群结队地拿着小木凳或夹着一张凉席,去江畔乘凉。江堤高低不平,踩在上面,一脚高一脚低。人们找着稍稍平坦的地方,展开凉席,躺下,不久便发出鼾声;有的人则围坐在一起讲闲话,欢快的笑声和江水拍岸的声音合在一起;还有的人索性跳进江水里,痛快地游着。月光放出银色的光,泻在幽幽的江面上,江面如一片辽阔的平原,衬托出远处星空更加璀璨。偶尔有轮船经过,悠长的汽笛声惊醒熟睡的人们,他们翻个身,很快又进入梦乡。

1980年代初,江面上的汽笛声日渐密集,客船、货船、渔船,走马灯似的在江面上穿梭;码头周边的旧房屋逐渐拆除,幼儿园、浴室、电影院、门面房如雨后春笋般竖起来。我家所在的那片平房也全部被拆除,邻居们集体迁到康熙河东面的楼房里。打那以后,我们生活的中心从江边变成了康熙河,而康熙河也变成了一条热闹的马路。

康熙河虽然热闹,可我对江水还是止不住地思念。刚搬来的前几年,我时常回到江边,看着一江水滚滚而去,闻着江风携来的草木芳香,凝望着漫漫滑下江水的红霞,将光阴拉得老长……

1990年代初,大轮码头客运站演变成城市最熙攘的中心,每天乘船来去的人络绎不绝,春运期

间,码头周边更是人山人海,客轮一票难求。乘客熙来攘往,码头周边垃圾堆砌,嘈杂和凌乱也同时到来。但潮水般的客流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商机和变化,海关大楼、港务大楼、盐业公司大楼、水利局大楼比邻而立,枞阳门商铺更是门庭若市,人潮涌动……

多年后,我从事水上工作,办公大楼正对着长江。1998年洪水期之后,安庆城重建防洪墙,上起狮子山,下至金家闸,全长近6公里。坚固、美观的防洪墙,不仅挡住了凶猛的洪水,还成就了一座新的文化地标,墙上雕刻着的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事件和风云人物,似乎正回望望着这座城市曾经的烟云。防洪墙内绿草如茵、树木如盖。冬天,大雪落在江边婆娑的树梢上,落在草地上,也落在穿梭的船只上,雪花从空中飞下,落入江水中,江面悄然无声,世界悄然无声。夏日的傍晚,江风送来亘古的清凉,有人在江边闲步,有人在江边唱起了黄梅戏,如水般的曲调落入水中,江水似乎也柔软了几分。长江还是过去的那条大河,但江水路过的这座城市正悄然换了一副容妆。

前年,我在江边附近买了套新房,搬离江畔近四十年又回到了长江边。每天早晨的上班路上,轮船的汽笛声从江堤那边传来,声声清脆,像是江水的亲切问候;夕阳西下,万道霞光泼洒在江面上,那是多么诗意的时光。走在长江边,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笑着,是的,能这样与一条伟大的河流朝夕相处,我是多么的有幸;这座城市能和这样的一条河流相依相伴,又是多么的幸运。